

# 外人與辛亥革命

張 玉 法

- (一) 前言
- (二) 列強對辛亥革命的態度
- (三) 參與辛亥革命的外國人
- (四) 租界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 (五) 結論

## (一) 前 言

清季國勢不振，當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外人的勢力早已進入中國。列強在中國獲有特殊利益和勢力範圍，外國教士和商人、銀行家和外交界人士，參與中國政治和社會事務<sup>①</sup>。中國革命運動與他們的在華利益息息相關，他們的態度也直接關係着中國革命運動。列強的態度，一般說來，可分為三種：其一、維護清政府的存在，以維護其既得的利益；其二、鼓勵革命，造成混亂，俾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其三、希望中國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穩定中國秩序使商務不受妨害。這三種態度，僅係某些國家所一度持有，並非固定的政策。大體說來，列強或同情革命，或同情滿清政府，悉以其本身的利益為依歸。不過，革命黨人每利用租界或外國為宣傳和策劃革命的基地，外國勢力無形中成為革命運動的翼助者。許多外國人，或以私人資格，或受其政府之命令，協助或參與了中國革命運動；雖然他們大多是出於利己的動機，對革命的助力也是很大的。

<sup>①</sup> Edwin J. Dingle, *China's Revolution* (London, 1912), p. 269.

## (二) 強列對辛亥革命的態度

清季革命運動，自始與列強發生關係。其原因有三：一、革命黨人希求列強在精神和物資上予以協助；二、清政府常利用外交關係，打擊庇身於租界或外國的革命勢力；三、列強伺機擴張其所獲有的特殊利益和勢力範圍，既欲利用清政府，又欲利用革命派。革命派為爭取國際同情，並避免外力干涉，重排滿而輕排外，並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及其既得的利益<sup>②</sup>。職是之故，革命運動所受到的主動外力干涉甚少；大部分干涉，來自清政府的外交壓力。另外一方面，列強有欲乘中國革命之機以獲漁利者，間亦對革命黨人表示友好。

檢討列強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來觀察。在武昌革命爆發前，革命黨人與列強的接觸以英、日、法三國為主。三國與革命黨人，無友善、不友善可言，大部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武昌革命爆發後，革命政府所面臨的問題較複雜。列強或主干涉，或主中立；革命政府初欲列強保持中立，繼求世界各國的承認。袁世凱異軍突起，代原有的革命派而為外交的核心人物。茲分述於下：

### (1) 武昌革命爆發前

最早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者為英國，其接觸點初在香港。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十月的廣州之役是從香港策動的。事敗之後，革命領袖孫逸仙逃香港，因不知香港政府的態度，旋即轉赴日本<sup>③</sup>。孫逸仙離港的次日，粵督譚鍾麟要求香港政府把孫交出。港督羅賓遜（Sir William Robinson）表示不願引渡政治犯，事遂終止<sup>④</sup>。然香港政府並無意庇護革命黨人；為了維護香港的治安，羅賓遜於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發佈了將孫逸仙放逐五年的命令，不欲孫再來香港<sup>⑤</sup>。

<sup>②</sup> 同盟會成立之初，發表對外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及其既得權利。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民國四十三年，世界書局影印）第一冊頁234。

<sup>③</sup> Sun Yat-Sen, "My Reminiscences," *The Strand Magazine*, No. 255, April, 1912.

<sup>④</sup>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98-99,

<sup>⑤</sup> 同上書，頁133。

一八九六年十月，倫敦清使館誘捕孫逸仙，並囚禁之。英國輿論以清使館侵犯英國法權，大加非難，如英國法學家賀蘭德（T. E. Holland）投書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謂孫之被禁於清使館，是對英國皇權的重大侵犯<sup>⑥</sup>。英國政府以此出面干涉，迫使清使館釋孫。孫誤以英國朝野對中國革命有同情之心，他於一八九七年九月離英經加拿大抵日後，聞香港政府對他有放逐之令，即寫信給香港總督府秘書洛克哈（J. H. Stewart Lockhart）抗議此事，信中有云：

據可靠消息，由於我企圖從滿洲慘酷的枷鎖中解放我可憐的同胞，香港政府已有令將我放逐。在倫敦時，我曾詢及幾個英國朋友，問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們以為這不合英國的法律與慣例。但在香港的中國朋友却告訴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可否請你告訴我這件事是否屬實？如果真有其事，我將訴之於英國大眾和世界各文明國家<sup>⑦</sup>。

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洛克哈率然覆孫一信，對孫的威脅之詞視若無睹，信中有云：

我奉命告訴你，英國政府無意使香港殖民地被陰謀顛覆友好鄰邦者用為庇護所。鑒於你的行為有這種記錄，即你在信中所曲意表達的，你要從滿洲的枷鎖中解放你可憐的同胞。如果你要在香港登陸，我們將依據一八九六年對你的放逐令，將你逮捕<sup>⑧</sup>。

英國這種不友好的態度，頗影響孫的革命活動。此後數年，孫大部分時間滯留日本，以大亞細亞主義，爭取日本朝野的同情與協助。

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拳亂，革命黨人欲運動粵督李鴻章據兩廣獨立，港督卜力（Henry A. Black）頗贊成之。然以時機未熟，李鴻章不應，港督亦未能解除對孫的放逐令<sup>⑨</sup>。

⑥ John C. H. Wu, *Sun Yat-Sen: The Man and His Ideas* (Taipei, 1971), p. 109。

⑦ Harold Z. Schiffrin, pp. 144-145.

⑧ 同上書，頁145。

⑨ 馮自由「革命逸史」（民國五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第四集頁92-100。

英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尙表現於另一例證上。光、宣之際，居正在仰光辦「光華日報」，倡言革命。清駐仰光領事蕭永熙電致外務部，謂居正在緬甸鼓吹無政府主義，請設法制止。外務部據此，請英公使電緬甸政府，將居正等押交粵省大吏懲辦，英使從之。幸舟過新加坡，該埠革命黨人延律師抗爭，始改爲自由出境<sup>⑩</sup>。

次於英國而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的是日本。孫逸仙於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失敗後逃抵日本，時雖與日本官方尙無接觸，日本報刊已喧騰廣州革命的壯舉，並稱孫爲「支那革命黨」<sup>⑪</sup>。日本甫於一八九四年戰勝中國，但在心理上還是懼怕西方帝國主義，故對亞洲國家的獨立運動，每寄以同情。同時，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以後，清政府聯俄，日政府欲在中國尋求新的友誼，亦需要聯絡民間的新興勢力。一八九八年康梁的維新運動，日本是支持的；次年孫逸仙欲協助亞奎諾多（Emilio Aquinaldo）的菲律賓獨立運動，也受到日本政府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一八九八年後，日本政府對革命與維新兩派的逋客同予庇護，並謀求他們之間的合作。當時日本憲政黨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傾向維新派，而許多急進之士則同情孫逸仙<sup>⑫</sup>。然所謂傾向或同情，不全在協助中國新興勢力的發展，半含有利用的味道。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的憲政黨內閣倒台，繼起的山縣有朋內閣傾向於軍事冒險。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拳亂，列強乘機在中國北方角逐；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認爲日本有機可乘，建議政府在福建發展。兒玉的建議得到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的支持，日本遂作佔領廈門的準備。當時孫逸仙正擬在惠州起事，因自香港謀求英國的協助不成，轉而與兒玉接觸。兒玉不僅允許臺灣爲策動革命的基地，並準備助以軍事物資和顧問人員。兒玉策動佔領廈門的陰謀，後爲伊藤博文得悉；伊藤極力反對。伊藤是日本文治派的領袖，時正掌理樞密院。他的對華政策是反對南進而側重北進，反對分割而側重保全。他認爲日本如佔廈門，列強將會採取干涉行動，因促使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反對此事。兒玉原奉命於八月二十九日採取行動，却在此前

<sup>⑩</sup>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8。

<sup>⑪</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1。

<sup>⑫</sup> 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9, 67, 80.



一日又奉命停止。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山縣內閣辭職，伊藤出而組閣。一週以後，惠州之役爆發。又二週，兒玉奉命取消孫逸仙在臺灣的指揮部，並驅逐孫逸仙及日人平山周等離臺，軍事物資和顧問人員的援助自然也歸泡影。兒玉援孫的目的，在配合其佔領廈門的計劃，今計劃既然中止，惠州戰役又陷於彈盡援絕，他自然無須再作不必要的冒險<sup>⑬</sup>。

惠州之役以後，日本朝野對中國革命運動漸失同情之心。其原因約有數點：一、中國的憲政運動逐漸展開，日本是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自然希望中國也實行君主立憲。中國爲了推行改革，已開始雇用日本的法律專家和軍事顧問，並派了許多留學生到日本學習。如是，則日本將大爲中國所依重。二、日本的政治領袖們已逐漸年邁、保守，而中國的革命黨人，則由於留日學生的增加，變得更年青、更激烈。不少中國革命黨人吸收了西方社會主義的思想，他們與日本左派人士接觸頻繁，使日本政府警覺。三、由於俄國在中國東北對日本構成威脅，許多早年同情中國革命的志士，都轉移注意力於對俄上，他們以去除俄國在東方的威脅爲第一義；成立於一九〇一年的「黑龍會」，即致力於將俄國勢力驅出黑龍江以南<sup>⑭</sup>。

日俄戰後，日本愛國之士滿足於日本在戰爭中所得，認爲日本可以其所獲得的強國地位達到慾望，不必再假手於中國革命黨人。同時，許多保守派的人士和軍人認爲，中國革命黨人的共和主義，會腐蝕日本的精神。一九〇六年初，日本文部省頒布規則，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活動。一九〇七年，日本政府受清廷之請，驅逐孫逸仙出境。是後，在東京的中國革命黨人與日本社會主義份子聯絡益密，更惹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由於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份子加以鎮壓，中國革命黨人的活動自然大受影響。不久，民報被封，孫逸仙及其日籍友人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的行動亦受監視<sup>⑮</sup>。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春，孫逸仙於廣州新軍之役失敗後自美東來，擬重整旗鼓。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事爲日警探悉，不准居留，孫不得已，由橫

<sup>⑬</sup> 同上書，頁83,97,100-103；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昭和四十五年，東京）頁69；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89-190.

<sup>⑭</sup> Marius B. Jansen, 頁100-110。

<sup>⑮</sup> 同上書，頁121-130。

濱渡檳榔嶼<sup>⑭</sup>。

當日本對中國革命黨人的活動加以限制後，革命領袖孫逸仙等即轉往安南，將其在東京的總部，移往河內。時安南為法國屬地，革命黨人也就與法國發生了密切關係。

法國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約始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秋。時孫逸仙由日赴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往見，謂法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之意，問以革命勢力如何？孫畧告以實情。又問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謂若聯絡成熟，法國政府立可相助。孫請彼派員協同辦理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孫調遣。孫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義生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事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偵悉，奏報清廷；清廷乃與法使交涉。法使不知情，請命於政府，問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勿問；清廷亦無可如何。未幾，法政府變更，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調回國<sup>⑮</sup>。

革命黨人所以能在安南建立基地，得力於安南總督韜美（Doumer）的協助。韜美的目的，無非想在中國南部擴展法國勢力。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革命黨人曾以安南為基地，在雲南發動過幾次革命暴動，得到法國文武官員的協助，安南的法國報紙對革命活動也大事報導，並加贊揚。清廷知革命黨人以河內為基地，乃向法國提出抗議，要求驅逐孫逸仙出境。由於革命起事的連次失敗，法國政府也就改變了態度，把孫逸仙逐出安南。後來孫逸仙到了歐洲，謀請韜美（時已卸任）協助，以便在安南重建基地，但未獲法國官方的支持<sup>⑯</sup>。

## (2)武昌革命爆發後

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列強對中國革命運動大都不很重視，前述英、日、法三國，間與革命黨人有接觸，不是打擊革命黨人，就是利用革命黨人。助力是偶然的，

<sup>⑭</sup>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國父全集」（民國四十六年，臺北）（二）頁93。

<sup>⑮</sup> 「國父全集」（二）頁88-89；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註」（民國五十四年，正中書局）頁122~125。

<sup>⑯</sup> 同註<sup>⑮</sup>書，頁125-126；Ta-ling Le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05-1912*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83.

並沒有把革命勢力視為中國的希望而予以持久的協助；限制是起於清廷的外交壓力，並沒有把革命勢力視為列強在中國發展的重大威脅而予以澈底破壞。武昌革命爆發後，革命有成功之望，列強的態度轉趨鄭重。此可就國內和國外兩方面的反應來觀察。國內方面，自黃花岡之役後，各地清吏恐慌，湖廣總督瑞澂與德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砲轟擊。及武昌革命爆發，瑞澂至漢口見德領事，謂義和團再起，要求踐約開砲。德領事以辛丑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要求領事團開會討論。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ël Reau）為孫逸仙舊友，於會中力言革命軍以改良政治為目的，非義和團，沒有排外色彩，反對干涉。美國領事以革命軍秩序井然，並盡力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贊成羅氏主張。英國代理總領事戈費（Herbert Goffe）以英美關係密切，俄國領事敖康夫（Ostroverkhov）以俄法關係密切，均贊成羅氏主張。當時德、日二國領事雖主干涉，亦無能為力。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革命軍政府照會漢口領事，承認清廷前此與各國所訂之條約，繼續擔負外債及賠款，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及既得權利。各國領事及公使當將此情報告各該國政府。十月十七、十八日，漢口各國領事及北京各國公使先後宣佈嚴守中立，並依據國際公法，杜絕武力干涉。此期間，瑞澂見德領事失約，無所依恃，逃往上海；武漢失其統馭，秩序大亂，乃予革命軍以可乘之機<sup>①⑨</sup>。丁格爾氏（Edwin J. Dingle）檢討武昌革命所以未受外力干涉，乃因它是文明革命，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與太平軍和義和團完全不同<sup>②⑩</sup>，洵為的論。

國外方面，據孫逸仙的了解：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無成見，一般輿論則同情革命。法國方面，民間和政府對革命均有好感。英國則民間表同情，而政府的政策追隨日本。德、俄兩國頗傾向於清政府，革命黨人與其民間接觸亦少。日本方面，民間表同情，政府的態度則不太友善。孫逸仙時在美國，他認為，在革命軍的對外關

<sup>①⑨</sup> 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民國四十年，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18-121；陳三井「法國與辛亥革命」，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頁241-243，惟謂與瑞澂有約者為英領事，不知其所據。據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頁200，要求領事團開會者是英領事，但不知英領事是否與瑞澂有約。又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五十二年，臺北）第二冊頁1405，十月十一日，革命軍攻占湖廣總督衙門，瑞澂走上兵艦，請英艦阻革命軍渡江，但不知是否為接約要求。

<sup>②⑩</sup> Edwin J. Dingle, *China's Revolution*, pp. 276-277。

係上，美、法兩國不必擔心，德、俄兩國無由交涉，而日本則因拒絕其登陸，無法前往。孫為促進革命軍的外交助力，乃偕美人荷馬李（Homer Lea）赴英交涉。時清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有川漢鐵路借款六千萬元，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日本以純粹民主政體不適用於中國，欲助清廷保有其統治權；而英國各屬地尙禁絕孫逸仙入境。孫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對孫之放逐令。三事皆得英國政府允許<sup>21</sup>。

如前所述，英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自始以自身的利益為依歸。武昌事起後，繼以各省獨立，英僑為保持其在長江流域及中國南部的商業起見，對革命表同情，英國的外交政策亦隨此而改變<sup>22</sup>。惟英國政府對君主、民主並無成見，欲中國有一強固政府<sup>23</sup>，以穩定中國局勢而已。時英國所注目的，不是滿洲的王朝，也不是基礎未固的革命黨，而是擁有實力的袁世凱。袁世凱於庚子拳亂期間，參加東南互保，使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不受波及；於一九〇五年全國抵制美貨期間，庇護美國商業，並協助美國向東三省投資；可謂為親英美的人物（日本之反袁以此）。據說，在武昌革命爆發的次日，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理事會即建議清廷，起用強有力人物，鎮壓革命。所謂強有力人物，即指袁世凱。為了向清廷推薦袁世凱，北京公使團曾經開會，由美國公使提議而獲得多數國家的贊成。十月十四日，清廷任袁為湖廣總督，繼又任袁為內閣總理，部分係受外交影響所致。十一月十二日，英國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曾致電英國外交部，建議政府積極支持袁世凱，英外相格雷（Edward Grey）於十五日覆電贊成<sup>24</sup>。格雷認為，只有袁世凱始能收拾中國混亂之局；朱爾典則聯合美、德、法、日、俄等國公使，努力促成南北議和<sup>25</sup>。

<sup>21</sup> 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註」頁184-185，惟將川漢鐵路借款誤為一萬萬元，今據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民國五十九年，正中書局）頁23修正為六千萬元。

<sup>22</sup>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240。

<sup>23</sup> 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頁115-116。

<sup>24</sup> 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頁201-203。

<sup>25</sup> 陳三井「法國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頁247-248。關於南北議和，早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袁世凱的代表蔡廷幹、劉承恩即持駐漢英領事的介紹函與黎元洪有所接觸。

法國方面，除前述駐漢領事羅氏同情革命外，駐滬領事拉巴蒂（Dejean de la Bâtie）亦同情革命，惟法國公使畢柯（Francois Georges-Picot）同情袁世凱。畢柯的態度可能影響了巴黎的外交政策，法國外長保安卡累（Raymond Poincaré）曾照會各國，主張由列強推薦袁世凱為中國總統的候選人<sup>26</sup>，其支持袁世凱的立場是很明顯的。

當時法國國內的報刊，對中國革命有廣泛的報導和評論。急進派人士（多隸社會黨）認為，革命軍紀律嚴明，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應予援助或同情，反對德國報紙瓜分中國的建議。保守派人士（多隸王黨）認為，中國革命將給歐洲帶來「黃禍」，不僅革命軍驅逐甚至殺絕外國人，日本且乘機獨霸中國，進而侵略西方國家，故主張維護清政府。中間派人士贊同中國革命，但不認為革命黨有維持中國秩序的能力，主張支持袁世凱<sup>27</sup>。法國外交界、財經界和工商界大體是同情袁世凱的，這三界人士與中國關係最大，故法國政府繼英國政府之後，採取了支持袁世凱的外交政策。

日本方面，民間及輿論頗同情中國革命。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新聞和實業界人士小川平吉、內田良平、三和作次郎、宮崎寅藏、福田和五郎、古島一雄、尾崎行昌、平山周、伊東知也、頭山滿、浦上正孝、中野正剛、小川運平等組織「有隣會

---

其後，袁世凱與革命軍政府之間的和平交涉，即在朱爾典的指導下進行，日、德、美、俄、法、英等國，亦與英國採取同一步驟。在上海和議進行之際，列強不僅予革命軍政府以外交壓力，各國輿論亦多袒護袁世凱，如倫敦「泰晤士報」以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較共和政體更適合中國國情，「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也以中國向無民主政府，孫逸仙的理想不易實行，不如讓袁世凱出山。及孫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和議破裂，各國報紙更對南京臨時政府加以指摘，認為孫無行政經驗，不能恢復和平。為了支持袁世凱，四國銀行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開始對袁借款；另一方面，即予革命軍的行動以種種不便，如十一月三日，上海革命軍佔領滬寧車站，列強即以中立為藉口，阻止革命軍使用鐵路。又如京奉鐵路的北京至山海關一段，列強亦依據辛丑條約予以佔領，對革命勢力的發展，頗為不利。又如一九一二年二月，英國向香港增兵二千三百人，雖未必謀對中國革命有所干涉，其對革命軍政府維持中國秩序的能力是深表懷疑的。參考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頁 204-208, 213-214, 217-218。

<sup>26</sup> 陳三井「法國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頁249。

<sup>27</sup> 張駿憲原著，何珍蕙摘譯「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民國五十年，正中書局）頁45-72。

」，以支持中國革命。有隣會曾派人赴中國各地與革命黨聯絡；革命黨方面，也派何天燭赴東京，通過有隣會，與日本各界有力人士接觸（有隣會受玄洋社的資助，可謂為玄洋社的附屬機構）。十二月二十六日，新聞和法學界人士波貞吉（萬朝報）、淺田工村（太陽）、工藤日東（日本新聞）、鵜崎鷺城（日日新聞）、上島長久（報知新聞）、古島一雄（萬朝報）、福田和五郎（二六新聞）、岩佐溪電（萬朝報）、浮田和民（東京朝日）、松山忠次郎（東京日日）、鹽谷恒太郎（法學界）、加瀨禧逸（法學界）、平松市藏（法學界）、石山彌平太等組織「支那問題同志會」，要求日本政府保障中國領土完數，並尊重中國民意，不隨便干涉中國政體。支那問題研究會一面與何天燭取得聯絡，一面派平松、工藤、鵜崎、岩佐等歷訪首相、外相，表示對中國革命同情，並反對政府的干涉方針。十二月二十七日，根津一（東亞同文會）、河野廣平、杉田定一、頭山滿、小川平吉、白岩龍平等組織「善隣同志會」，亦致力於中國革命的支援工作。不可否認的，這些團體多與推展日本的大陸政策有關。為推展此一政策所組織的團體，前此已甚多，如黑龍會、玄洋社、東亞同文會、太平洋會等，它們無時不找機會在中國和亞洲大陸建立勢力。以太平洋會為例，當武昌革命軍興之際，曾議定了「保全中國並支援革命軍」的方針。該會中心人物如大竹貫一、五百木良三、中野二郎等，與革命軍和滿清官僚方面都有直接或間接的來往。當革命軍佔領上海後，該會曾遣法學博士寺尾亨為革命軍政府的法律顧問<sup>29</sup>。

日本政府方面，其一貫政策是助長中國內亂，以坐收漁利。武昌革命爆發以前的情形，前已述及，茲不多論。武昌革命爆發以後，日本政府對清軍與民軍兩方，均派有助戰之人<sup>30</sup>，冀圖事態擴大，以利干涉。早在四川爭路風潮初起時，日本政府即派齋藤季治郎赴長江一帶活動。武昌革命爆發時，齋藤在漢口，曾派人前往上海，協助革命黨起事。及革命軍勢力擴大，日本政府乃思有以干涉之<sup>31</sup>。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致電美國國務卿諾克斯（Knox），謂清政府曾要求日本

<sup>29</sup> 曾村保信「辛亥革命與日本輿論」，李永熾譯「歷史與思想」（民國五十八年，水牛出版社）頁67-69。

<sup>30</sup>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Flowery Republic* (New York, 1913), p. 332.

<sup>31</sup>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214。

派兵平亂，因日本在華利益尚未受到嚴重威脅，列強亦未作如是籲請，故暫不採取行動。但如革命勢力波及滿洲地區，日本將不經列強同意，逕行派兵前往中國平亂。日本預計派二萬人至北京<sup>③①</sup>。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訓令日本駐英公使，申明干涉革命、支持清廷的主張。內田以中國不宜實行共和制度，期望英國政府同意，以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制，為調停清廷與革命軍衝突的方針<sup>③②</sup>。十二月七日，內田通知美國駐日大使白里安（Bryan），謂如南北的敵對行為不能中止，日本政府認為有干涉的必要。十二月十八日，日本駐華盛頓代辦致書美國國務院，提議由列強共同維護滿清政權的名義存在。一面為中國制定憲法，以限制清廷的獨裁權力；一面消除共和思想，使革命黨人了解建立共和的不合實際。日本政府的立場，不為美、德、英國所同意；英國政府的立場尤為堅定（可能與孫逸仙在英國的活動有關）。駐日英使寶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曾三次奉命阻止日本的非中立行動，第一次抗議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的維持清廷聲明，第二次抗議日本擬貸款給清廷，第三次抗議日本擬用武力干涉革命。英國的強硬態度，使日本不便輕舉妄動<sup>③③</sup>。

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是不友善的。前已述及，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務省支持清廷實行君主立憲，反對共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犬養毅訪華，內田外相告訴他說：「如中國這樣的國家，怎能施行共和政治？帝國政府絕對反對革命黨的主張，決意以武力援助清政府推行君主立憲。你可把這方針轉告南方革命黨。」日本政府干預革命的政策，與一批元老重臣的態度相表裏。山縣有朋要求干預中國內亂，派兵保護滿蒙；桂太郎認為日本應與英國聯合，迫使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大隈重信建議日、英聯合，以謀中國秩序之恢復。但由於日本政府的干預政策未能獲得列強的支持，持重的西園寺公望內閣不得不另外謀求發展<sup>③④</sup>，而發展的方向之一則

③① C. T. Lia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4.

③② 同註③①，頁67。

③③ 同註③①，頁26-27, 44-45；同註③②，頁241-242。

③④ 彭澤周「辛亥革命與日本西園寺內閣」，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六冊（民國五十三年，文星書店）頁34-35；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pp. 134-136。

爲聯合革命黨，以打擊袁世凱。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犬養毅偕同松平康國、柏原文太郎、柴田鄰次郎、寺尾亨、副島義一等抵上海，頭山滿、古島一郎、美和作次郎等隨後亦到。他們是否爲日本政府的說客，不得而知，惟確有意左右革命黨的革命方略。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犬養毅與孫逸仙、黃興會於南京臨時大總統府，建議聯合岑春煊、康有爲以對抗袁世凱。此種意見與革命黨的傳統與方略格格不入，自難被採納。孫逸仙表示：岑、康素與革命爲敵，不會真心協助革命。二月二十五日，黃興亦向犬養表示，不能與袁世凱斷絕關係<sup>⑤</sup>。

犬養等人的活動無所成就，日本政府的干涉政策無由實現。此後，日本漸與列強協調進行，以謀在華利益之發展。

此期間，日本志士對中國革命的態度陷於分歧：一派以川島浪速爲首，主張讓革命軍佔有黃河以南，扶植滿人於黃河以北，把袁世凱的勢力消除。他決定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受日人左右的滿洲國，並與蒙古王公訂約，使日本在內蒙享有優越勢力，以軍火、物資和經濟的援助爲交換條件。後以日本參加銀行團，準備對袁政府借款，始制止了川島的陰謀。另一派人欲力助革命黨人的成功，當初孫逸仙雖遠在美、歐，由於宋教仁的聯絡，不少日人前往武漢助戰。孫逸仙歸國後，得到日本志士的幫助，向日本實業界貸得三筆款項<sup>⑥</sup>。惟因日本政府初欲支持清廷，繼以打擊袁世凱不成，又隨同列強支持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自日本所獲的援助是微弱的。

由上所述，日本政府與民間均在廣泛地參與辛亥革命，或思有以促成之，或思有以左右之或干涉之。英國因懼怕日本干涉，乃使朱爾典支持南北議和；與英國採取相同政策的各國，則用了各種方法，使此一議和達成協議<sup>⑦</sup>。

圖謀干涉辛亥革命的國家，除日本外，尚有俄國。俄國與日本相結，初欲支持清廷，以保有其在中國既得的利益<sup>⑧</sup>。既見中國局勢混亂，乃乘機窺伺滿蒙，進佔

<sup>⑤</sup> 註④引彭澤周文，吳書，頁35-37；黃興以革命軍多烏合之衆，無法與袁世凱對抗，故主聯袁，見胡去非「孫中山先生傳」（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商務）頁143。

<sup>⑥</sup> 註④引 Jansen 書，頁147-157。

<sup>⑦</sup> 同上，頁152。

<sup>⑧</sup> 註④引彭澤周文，吳書，頁29。



呼倫；俄蒙和約，由是成議<sup>③⑨</sup>。惟俄國這種乘火打劫的行爲，限於邊疆，於中國大局，尙無多大影響。

另如德國，曾派兵在漢口登陸，企圖干涉革命<sup>④①</sup>。或謂清軍利用德租界運送軍火<sup>④②</sup>，或謂德人有以私人資格幫助清軍者，使武昌、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爲之譁然。惟德政府極端否認干涉，且促使美國聲明「尊重中國主權」<sup>④③</sup>。

辛亥革命所以未受外國的武力干涉，一因無論清軍及革命軍皆努力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使外人無所藉口；一受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列強曾屢次發表宣言，表示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sup>④④</sup>。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英、法等國在外交上的折衝；它們爲早日恢復中國秩序，置原有的革命黨人於不顧，而傾向擁有實力的袁世凱。此一傾向，使財力匱乏而又缺少外援的革命黨人無法抗拒，不得已而採取了聯袁政策<sup>④⑤</sup>。聯袁是辛亥革命中的一個重大錯誤，這錯誤是在外力的影響下造成的。恰如俄國革命後，中國國民黨在俄國影響下，實行容共；抗戰勝利後，在美國影響下，與共黨和談。

### (三) 參與辛亥革命的外國人

在清季革命運動中，革命領袖大部活動於海外，或托庇於租界，其與外國人接觸是很自然的。外國人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或基於其與革命領導人的友誼，或基於其個人的興趣與抱負，有些則是奉其政府之命與革命黨人聯絡的。

外人與革命黨人接觸，初以孫逸仙爲主要對象；陳少白、謝纘泰、宋教仁、黃興等，也與外人有往來。外人以其特殊身份，幫助革命黨人解決了不少難題。然外

③⑨ 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245。

④① 張復蕊著，何珍蕙摘譯「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53。

④② 註④①引彭澤周文，吳書，頁4-5。

④③ 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民國十八年，中華書局）頁4。

④④ 同上，頁20；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242,245-246。

④⑤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 304.

人援助革命，每有其官方的或私人的企圖，使中國革命蒙其利，亦受其害。

探討外人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此處採取兩個途徑：其一為個別的觀察，其二為統計分析。茲據初步統計所得，將直接、間接參與清季革命的外國人表列如下<sup>④</sup>：

姓 名	國籍	出身	身 與 革 命 之 關 係	資料來源
工藤日東	日本	「日本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久原房之助	日本	礦業家	資助革命	B. Q
三上豐夷	日本	實業家	資助革命，運送彈藥	B. R
三和作次郎	日本	「有隣會」會員	武昌事起後至中國協助革命	K
三原千尋	日本		參與汕尾之役及武昌革命	C. D. P
山下稻	日本	退職軍人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I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職軍人，教師	於庚子惠州之役遇難	B
山田純三郎	日本	上海日本商店店員	武昌事起，為革命籌款	B
山座圓次郎	日本	政務局長	協助革命	D

④ 本表所依據的資料：A. 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民國四十年，中央文物供應社。B. 陳固亭「國父與日本友人」，民國五十四年，臺北幼獅書店。C.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民國四十三年，臺北世界書局。D. 宋越倫「總理在日本之革命活動」，民國四十二年，中央文物供應社。E. 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F. 宋教仁「我之歷史」，民國五十一年，臺北文星書店。G. 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註」，民國五十四年，臺北正中書局。H.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國父全集」(二)「孫文學說」。I. 馮自由「革命逸史」。J. 左舜生「黃興評傳」，民國五十七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K. 曾村保信「辛亥革命與日本輿論」。L. 胡百華譯「雙十·荷馬李的故事」，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M. 日人杉山龍丸於一九四五年蒐集與中國革命有關之日本人，共得二八三人，因未悉是否均為參加辛亥革命者，僅錄已知逝於一九一一年以前者。名單見彭澤周「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附，吳桂淮編「中區現代史叢刊」第五冊頁51-79。N. 彭澤周「辛亥革命與日本西園寺內閣」。O. 張韻蕊原著，何珍蕙摘譯「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P. 宮崎滔天「支那革命軍談」，一九六七年，東京。Q.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贊助中國革命之日本友人名錄」(民國六十年，油印)，此名錄略同前述杉山龍丸所蒐集者，惟間有數人注明其革命事蹟，可參證其是否參加辛亥革命。R.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昭和十六年，東京。S. 據刻正研究「韓國獨立與中國革命」的胡春惠先生示知，韓人參與或同情辛亥革命者有申鍾、金凡齋、曹成煥、朴泳孝等人。T.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上島長久	日本	「報知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下田歌子	日本	「東洋婦人會」創辦人	為中國革命籌募資金	Q
大石正己	日本	進步黨領袖	同情革命	B
大竹貫一	日本	「太平洋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大松源藏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R
大原武慶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R
大原信	日本			M
大崎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I
大隈重信	日本	進步黨領袖	同情革命	B
大塚原太郎	日本	美國日僑，業商	協助革命，參預機密	D
川村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助辦外交	D. R
小川平吉	日本	「有隣會」會員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K
小川運平	日本	「有隣會」會員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K
小山田劍南	日本	記者	同情革命	D. R
小池張造	日本	政務局長	協助革命	B
小長谷政治	日本	船員	隨宋教仁去東北調查革命	F
小室健次郎	日本		助日野辦青山軍事學校	C
小幡虎太郎	日本		辛亥在天津活動，謀助革命	D. R
小鷹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R
久原房之助	日本	礦業家	資助革命	R
中久喜信周	日本	記者	以文字同情革命	D. R
中島勝次郎	日本	實業界人	資助革命	R
中野二郎	日本	「太平洋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中野正剛	日本	「有鄰會」會員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K
中野德次郎	日本	實業家（衆議員）	資助革命	B
水野梅堯	日本		同情革命	D. R
犬養毅	日本	進步黨領袖	協助革命，辛亥曾至中國活動	B. L. R

大塚信太郎	日本	實業家	資助革命	B
太田信藏	日本	浪人	同情革命	R
五百木良三	日本	「太平洋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戶水寬人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內田良平	日本	學者，黑龍會員	資助革命並參與革命活動	B. K
日野雄藏	日本	少校軍官	助孫逸仙辦青山軍事學校	E
田中舍身	日本		同情革命，參與辛亥之役	D. R
田野橋次	日本	新聞界	同情革命	M
甲斐靖	日本	步兵中尉	參與武昌革命，受傷	D
布施茂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R
本庄繁	日本	駐滬武官	協助革命	R
加藤夫	日本			M
加藤清藏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P
加瀬禧逸	日本	法學家	同情革命	K
平山周	日本	外務省職員	同盟會員，參與革命活動	B. K
平松市藏	日本	法學家	同情革命	K
平岡浩太郎	日本	礦業家（衆議員）	資助革命，並參與革命活動	B. Q
北一輝	日本	國社主義運動家	同盟會員，參與革命活動	C. N
可兒長一	日本		協助革命，提供武器	B
石山彌平太	日本	「支那問題同志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石丸鶴吉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P
石間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死於漢水	D. R
末永節	日本	退職軍人（船員）	參與革命，助辦外交	B. Q
白岩龍平	日本		同情革命	K
古川清	日本	役於東北馬賊	助宋教仁聯絡馬賊	F
古島一雄	日本	記者（衆議員）	協助革命，參與辛亥之役	B. K. R
古賀廉造	日本	警保局長	協助革命，民報借屋保證人	D. R

玉水常喜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P
伊東正基	日本	退職軍人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I
伊東知也	日本	「有隣會」會員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D
吉田	日本		武昌事起後，助辦外交	D. R
寺西	日本	駐漢武官	同情革命	R
寺尾亨	日本	法學博士，教授	協助革命，任法制顧問	K. L
池亨吉	日本		同盟會員，參與鎮南關之役	G. Q
安川敬一郎	日本		資助革命	B. H
安永藤之助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M. P
佐佐木象山	日本		同情革命，參與辛亥之役	D. R
佐藤正	日本	「東亞同文會」會員	同情革命	B
谷村幸平太	日本		參與辛亥革命，在天津陣亡	D. R
尾崎行昌	日本	「有隣會」會員	參與惠州之役	K. P
尾崎行雄	日本	進步黨領袖，議員	同情革命	B
杉田定一	日本	「善隣同志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杉浦和介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P
坂本金彌	日本		資助並協助革命	D
岡木柳之助	日本			M
的野	日本	經營糧食店		I
近藤五郎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P
松山忠次郎	日本	「朝日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松方幸次郎	日本		同情革命	R
松木壽彥	日本	日本軍官	協助運械	C. Q
定平伍一	日本		協助運械	C. M
河野廣平	日本	「善鄰同志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金子克己	日本	步兵大尉	參與武昌革命，戰死	C. K. R
金子新太郎	日本			M

岩田愛之助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受傷	D. R
岩佐溪電	日本	「萬朝報」記者	同情革命	K
岩崎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兒玉源太郎	日本	臺灣總督	謀助庚子惠州之役	C. M
和田一郎	日本		同盟會財務委員	D
和田三郎	日本			D
相島勤次郎	日本	「日日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前田九二四郎	日本	日本軍官	協助運械	D. Q
後藤幸吉郎	日本			D
後藤新平	日本	臺灣民政長官	謀助庚子惠州之役	C. M
南方熊楠	日本	任職大英博物館	助孫逸仙脫倫敦之難	B
美和作次郎	日本		同情革命，辛亥曾至中國活動	R
垣內喜代松	日本	在香港業醫	資助並協助革命	C. R
秋山定輔	日本	衆議員	為革命籌款購械	B
原二吉	日本		參與武昌革命	D. R
原口聞一	日本	學者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原楨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P
神尾茂	日本	記者	以文字同情革命	D. R
神鞭知常	日本			M
柴田麟次郎	日本		參與惠州之役及辛亥之役	P. R
高橋謙	日本	學者，「東亞同文會」會員		I
根津一	日本	「東亞同文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浮田和民	日本	「支那問題同志會」會員	同情革命	K
浦上正孝	日本	「有鄰會」會員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K
浦上淑雄	日本		同情革命，曾至中國活動	Q. R

宮崎民藏	日本	「土地復權同志會」會員	辛亥任革命黨軍需	B. Q
宮崎寅藏	日本	民藏弟，「有隣會」會員	同盟會員，參與革命	B. K
宮崎彌藏	日本	民藏弟	同情革命	B. Q
島田經一	日本	退職軍人，「玄洋社」社員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及武昌革命	C. I. P
淺田工村	日本	記者	同情革命	K
掘井覺太郎	日本	明德中學教員	助華興會造炸彈	J
望月三郎	日本		助運軍械	C
梅屋莊吉	日本	商人	協助革命	B
陸奥宗光	日本	「東亞同文會」會員	同情革命	B
陸實	日本			M
副島義一	日本	早稻田大學教授	協助革命，任法制顧問	H. L
副島種臣	日本	內務大臣	同情革命	B
清藤幸七郎	日本	退職軍人	參與惠州及武昌之役	B
清藤秋子	日本	清藤幸七郎之姊	為中國革命籌募資金	Q
野中保教	日本	步兵大尉	參與武昌革命	D. R
斯波貞吉	日本	「萬朝報」記者	同情革命	K
菅原傳	日本	基督教士	同情革命	B
曾根俊虎	日本	退役海軍大尉	同情革命	B
蒯池良一	日本	衆議員	參與革命活動	B. Q
鈴木久五郎	日本	股票商人(衆議員)	資助革命	B
益野長知	日本	退職軍人	同盟會員，籌款購械	B
福本誠	日本	學者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福田和五郎	日本	「二六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遠藤隆夫	日本	退職軍人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C
頭山滿	日本	「黑龍會」會員	協助革命，辛亥曾至上海	B. K. R

櫛引武四郎	日本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P
澤村幸夫	日本	記者	以文字同情革命	D. R
龜井祥晃	日本	和尚	參與武昌革命	D
齋藤	日本	工兵軍曹	參與武昌革命	D. R
鶴崎鷺城	日本	「日日新聞」記者	同情革命	K
藤瀬政次郎	日本	上海三井洋行支店長	資助革命	R
鹽谷恒太郎	日本	法學家	同情革命	K
金玉均	朝鮮	宮崎寅藏之友	同情革命	B. P
申禔	朝鮮	軍官	同盟會員，參與武昌革命	S
金凡齋	朝鮮		任革命聯絡及保管文件	S
曹成煥	朝鮮		同情革命	S
朴泳孝	朝鮮		同情革命	S
貝魯斯托斯基	俄國	革命黨人	同情革命	F
蓋魯西約尼	俄國	革命黨人	同情革命	R
芙蘭諦文 Frank Damon	美國	教師	同情革命	A
嘉嘉理 Rev. Hagar	美國	傳教士	同情革命	I
奇列	美國	化學師	乙未在廣州助製炸彈	A
香汴文	美國	傳教士	乙未廣州之役協助革命	I
嘉約翰 John G. Kerr	美國	廣州博濟醫局醫生	乙未庇護革命黨人	C
荷馬李 Homer Lea	美國	軍事學家	辛亥隨孫逸仙赴歐辦外交	A
義班尼恩 Ansel O'Banion	美國	退役軍官	孫逸仙在美時充侍衛	L
彭西 Mariano Ponce	菲律賓	菲獨立黨駐日代表	以巨款資助革命	I. P
柏氏 Victor Bache	丹麥	練兵教習	在檀島教興中會同志兵操	A
考萊凱 A. kollecker	德國	傳教士	同情革命	T



卜力 Henry A. Black	英國	香港總督	同情革命	A
康德黎 James Cantile	英國	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	協助革命，救助孫逸仙	A
加銀根 Archibald R. Colquhoun	英國	記者	以文字宣揚革命方畧	A
高文 Tom Cowen	英國	記者	乙未廣州之役，起草英文宣言	A
克銀漢 Alfred Cuningham	英國	記者	參與洪全福之役，救助黨人	A
鄧勤 Chesney Duncan	英國	記者	乙未廣州之役，草英文宣言	A
孟生 Patrik Manson	英國	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	助孫逸仙脫倫敦之難	A
格斯科因 Gascoigne	英國	武官	同情革命	T
哈斯頓 J. Scott Harston	英國		同情革命	T
馬里遜 G. E. Morrison	英國	記者	助洪全福之役	A
摩根 Rowland J. Mulkern	英國	軍事家	參與庚子惠州之役	A
黎德 Thomas Reid	英國	記者	參與乙未廣州之役	A
司麥脫 Colin Mcd. Smart	英國	記者	同情革命	T
史密斯 D. Warren Smith	英國	記者	同情革命	T
凱可斯 Robert de Caix	法國	學者	發表演說，介紹中國革命	O
克雷孟梭 G. E. B. Clemenceau	法國	首相	同情革命	A
狄氏	法國	砲兵上尉	參與鎮南關之役	A
韜美 M. Paul Doumer	法國	安南總督	同情革命	A
都倫 Dureng	法國	學者	著書介紹中國革命	O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法國	文學家	同情革命	O
李安利 Leoni	法國		在西貢助賣軍債券	I
賴根第 Legendre	法國	學者	發表演說，介紹中國革命	O
麥朋 A. Maybon	法國	學者	著書介紹孫逸仙思想	O
米爾 Pierre Millé	法國	文學家	同情革命	A
歐極樂 Oxil	法國	駐天津武官	協助調查革命	A
畢恭 Stephen Pichon	法國	外交部長	同情革命	A
布加卑	法國	駐天津少校軍官	遣武官助孫逸仙調查革命	A
伯希和 Paul Pelliot	法國	漢學家	同情革命	O
羅氏 Monsieur Reau	法國	駐漢口領事	贊助革命，請各國勿加干涉	A
路茲 J. Rodes	法國	記者	著書介紹中國革命	O

上列共一九三人，以國籍、出身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分，可如下表<sup>⑥</sup>：

國籍	日本	法國	英國	美國	朝鮮	俄國	菲律賓	德國	丹麥	總計
出身	政界	16	4	1	0	0	0	0	0	21
	軍界	18	3	2	1	1	0	0	1	26
	工商界	11	0	0	0	0	0	0	0	11
	學界	12	7	2	3	0	0	0	0	24
	新聞界	15	1	8	0	0	0	0	0	24
	其他	5	0	0	3	0	2	1	1	12
身	69	1	1	0	4	0	0	0	0	75
對革命的態度	直接參與	75	2	1	2	2	0	0	0	82
	協助	22	4	7	4	0	0	1	1	39
	同情	39	5	2	1	3	2	0	1	53
	不詳	10	5	4	0	0	0	0	0	19
總計	146	16	14	7	5	2	1	1	1	193

⑥ 以出身分：由工商界入政界者以工商界計，由新聞界入政界者以新聞界計，「其他」包括傳教士、僑民

此一統計，並不完全。據胡漢民調查，孫逸仙的日本知友約近三百人，事蹟多已不可詳考<sup>④⑦</sup>；又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的鎮南關、河口等役，法人參與者亦多<sup>④⑧</sup>，惟多無姓名可查；而同情中國革命者，則更無法確切統計。

在調查所得的外人當中，日人約佔百分之八十，對革命的參與最多。如犬養毅，以政黨領袖支持革命，一八九七年孫逸仙至橫濱，犬養遣宮崎寅藏與平山周往迎，並介紹孫與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等相見，使孫得結交日本政要，其後宮崎寅藏前往中國之一切費用，皆由犬養供給；大隈重信內閣之同情革命，亦犬養所主張<sup>④⑨</sup>；武昌革命爆發後，犬養且促使日本國會承認南京政府<sup>⑤⑩</sup>。如宮崎民藏，其土地均享說影響孫逸仙的平均地權論，武昌事起後，且駐上海，任革命黨軍需<sup>⑤⑪</sup>。如宮崎寅藏，於庚子惠州之役，代表孫逸仙入廣州，謀兩廣獨立。一九〇五年，介紹黃興、宋教仁等與孫逸仙見面，促成同盟會成立。一九〇六年創「革命評論」，時為中國革命作宣傳；次年，孫逸仙委在日本全權辦理籌資購械，以接濟革命<sup>⑤⑫</sup>。如池亨吉，曾充孫逸仙英文秘書，並參與丁未鎮南關之役<sup>⑤⑬</sup>。如末永節，於武昌事起後，偕黃興至武漢，力勸日本駐漢口領事松村及海軍武官大中，勿干涉革命軍事<sup>⑤⑭</sup>。如山田良政，參與庚子惠州之役，為清兵所捕殺<sup>⑤⑮</sup>。法國方面，如砲兵上尉狄氏，於襲取鎮南關時連佔三要塞，作戰頗為驍勇<sup>⑤⑯</sup>。如駐河口領事羅氏，協助河口革

、船員、浪人、革命黨人。以對革命的態度分：直接參與指直接加入革命組織或直接參加籌劃、暴動、籌款、購械、運械者；協助指不直接參與革命組織與活動，但提供金錢、活動場所，並予革命活動以便利者；同情指以文字偏袒革命或常與革命黨人往還者。

④⑦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頁59。

④⑧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頁191-219。

④⑨ 宋教仁「我之歷史」頁66；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頁59。

⑤⑩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Flowery Republic*, p. 324.

⑤⑪ 陳固亭「國父與日本友人」頁4；野澤豐「孫文と中國革命」頁27。

⑤⑫ 同上陳固亭書，頁6-7；宮崎滔天「支那革命軍談」頁241。

⑤⑬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309。

⑤⑭ 同註⑤⑮陳書，頁72-73。

⑤⑮ 同上書，頁51-53。

⑤⑯ 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頁112。

命軍事；轉任駐漢口領事後，適武昌革命事起，曾力勸各國勿加干涉。另如英人康德黎之營救孫逸仙脫倫敦之難，美人荷馬李於武昌事起後隨孫逸仙赴英辦理外交等，均為重要的革命助力。惟外人支援中國革命，大部有如曾村保信所指斥日人者——純出於利己動機<sup>④9</sup>。中國革命所獲得的利益，大多為外人利益之餘，不足以自豪。

#### (四) 租界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清季外力入侵，外人為便於在中國居住、通商，要求於各商埠劃定一特定區域，俾各國商民得租地建屋，設立行棧：此即租界的由來。租界的設立，始於一八四五年的上海英租界。一八四九年，法國亦於上海設租界。一八六〇年後，英、法等國復於廣州、鎮江、九江、天津、寧波等地設租界。至甲午戰後，日、俄等國亦加入劃設租界的行列，而有漢口、杭州、廈門等租界的設立<sup>⑤0</sup>。租界以內的事宜，由各國自設機關管理，中國無權干涉，造成中國領土內的「政治孤島」。這些政治孤島，一方面是外力入侵的基點，中國主權被剝奪的象徵；另一方面也是西洋文化的櫥窗，中國改革的借鑑，政治犯的庇身所。如果撇開國家主權問題不談，這些政治孤島對近代中國政治運動有其積極的意義。

一九一三年，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以租界為策動革命的基地，並以租界為遁逃蔽。「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 著論云：若無上海、長江各處租界，尤其是日本租界的庇匿，則一切革命黨人業已被捕，而革命運動亦早為政府削平。又云：所有各種策劃革命之舉，其線索無不發自上海、漢口租界。該報述及江西都督李烈鈞被袁世凱撤職後，如何逃避上海租界，又如何由上海租界策劃江西起事；預計李於失敗後將再逃上海，重新鼓動。該報並謂：中國政府一日不能逮捕租界內之革命份子，革命事件將永無停止<sup>⑤1</sup>。此一論述，透出了租界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④9 曾村保信「辛亥革命與日本輿論」，李永熾譯「歷史與思想」頁71；所謂利己的動機者，如頭山滿、內田良平是執行日本的大陸政策，平岡浩太郎、大石正己是欲使日本的產業資本在中國取得一席之地。只有急進派的民權主義份子如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是站在亞洲人自救的立場來參與中國革命的。見彭澤胤「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五冊頁24-25。

⑤0 外人先後於各地劃設租界事，散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五十二年，臺北）一書。依陳三井「租界與中國革命」（中華民國史料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和鄭合成「中國經濟史研究」頁396-397合併統計，外國在中國劃設租界二十三處，其中英、日各一五，美六，法五，俄、德各四，比、意、奧各一。

⑤1 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頁68-69。

；清末的情形，和民初一樣。

利用租界的庇護從事反政府活動，至遲起於太平天國時代。一八五三年，劉麗川率小刀會衆起於上海，與官軍對峙年餘。上海法、英、美國租界當局初持中立政策，允許劉麗川的部屬出入租界。後因戰事延長，影響商務，法國租界當局首先作干涉之舉，不僅杜絕劉麗川的部屬進入租界，且派兵幫助清軍，至一八五五年二月，上海乃爲清軍克復<sup>④</sup>。

論及租界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不是說租界當局贊助中國革命，也不是說他們允許革命黨人從事暴亂活動；只是租界與滿清統治下的區域比較起來，較便於革命的活動而已。這可分爲幾方面來說：其一、租界內有較多的言論自由，革命黨人可於租界內刊發報紙，從事革命宣傳。其二、於租界內從事革命活動，如涉及擾害治安，通常僅受租界當局的取締與懲處，不至直接受清政府的迫害。其三、租界內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革命志士集結較易，可以造成一股勢力。

中國報紙在租界出版的，當以一八七二年創刊的「申報」爲最早。其後較爲重要的有創於一八九三年的「新聞報」，創於一八九六年的「蘇報」，創於一九〇三年的「國民日日報」和「俄事警聞」，創於一九〇四年的「警鐘日報」和「時報」，創於一九〇九年的「民呼報」和「民吁報」，創於一九一〇年的「民立報」等，地點均在上海。這些報紙都享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對於中國政治的評論通常不受干涉。對革命黨人所辦的報紙，清政府常欲竭力壓制，甚至想不經會審公廨（一八六四年創設）的判決，封閉某些報紙，但爲租界當局所反對。租界當局堅持，任何報紙的封閉，均須經過會審公廨的判決。以一九〇三年的蘇報案爲例，若非租界當局的堅持，首事諸人可能遭清政府的處決<sup>⑤</sup>。

蘇報於一八九六年由胡璋創辦，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悅的名義，在日本領事館註冊，後由陳範承辦。一九〇三年六月，蔡元培、章炳麟、吳稚暉、鄒容、章行嚴等假蘇報宣傳革命，言論激烈。章炳麟直呼清廷爲小醜，鄒容著「革命軍」，排滿尤

<sup>④</sup> L. F.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New York, 1959), pp. 25-27; 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民國二十年，上海）頁33-42。

<sup>⑤</sup>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1928), pp. 179-180.

力。清廷忌，命蘇撫及上海道等向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首事者，租界當局不允。嗣在會審公廨設額外公堂，由上海縣令會審，並延律師聲述案由。先後會審四次，由上海縣下諭，謂「章、鄒等照律治罪，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宣佈皇仁，援照擬減，定為永遠監禁」。上海領事團對此判決持異議，乃移北京交涉。至次年五月，改判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sup>62</sup>。

租界作為革命宣傳的機關所在地，其言論自由是有其限度的。一方面租界當局可徇清政府之請，封閉報館，逮捕記者；另一方面，人身攻擊和對列強的批評則不被允許。同時，報刊亦不得公開鼓吹暗殺等暴力活動。一九〇四年，租界當局拘捕「警鐘日報」記者，並沒收印刷機器，即因其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鼓吹暗殺所致<sup>63</sup>。一九〇九年七月，上海「民呼日報」的停刊，主筆于右任、陳飛卿的被捕，為一連串的「毀壞名譽」案所牽聯。同年十二月，民呼日報的被封，則出於日本駐滬領事的脅迫；因為民呼日報不斷揭發日本侵華的陰謀，並聲援韓國革命運動<sup>64</sup>。

租界作為策劃暴動的根據地，在革命運動的初期尚不重要。革命運動的中心初在南方，與孫逸仙有關的十次革命，是以香港或安南作為策動基地的。惟香港的地位如同租界：其一、它距廣州很近，對於以廣州為中心的革命活動，有指使之便。其二、香港以中國居民佔多數，便於革命的聯絡及革命勢力的擴展。而且香港對外交通便利，更適合作為革命運動的聯絡站。

租界之用為革命活動基地者，以上海與漢口兩地為最重要。上海租界，一九一〇年約有六〇萬中國人，一萬三千外國人，幾佔上海總人口的一半<sup>65</sup>，故為革命活動的重要區域。除革命報刊如「蘇報」、「國民日日報」、「民立報」等設於租界外，吳稚暉等演說革命的張園在租界，以培養革命幹部為目的的「愛國學社」設於租界。愛國學社教員及學生於張園演說革命時，巡捕對首事諸人如吳稚暉、蔡元培等也加以傳詢，但每次皆言：倘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sup>66</sup>。華興會與

<sup>62</sup> 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註」頁61。

<sup>63</sup> 陳三井「租界與中國革命」，「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232。

<sup>64</sup> 陳祖華「于右任先生創辦革命報刊之經過及其影響」頁74-89, 133-144。

<sup>65</sup> 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頁266-267。

<sup>66</sup> 吳稚暉「中山先生年系」，「國父與江蘇」頁339。

光復會於上海租界設立機關，同盟會在上海的組織與活動，亦集中於租界。辛亥上海光復，陳其美、李燮和等以租界為策動處所。以漢口論，租界向為革命黨人集聚之地，或開報館，或秘密集議，或製造炸彈。武昌革命的爆發，即因孫武在俄國租界製造炸彈，不慎爆發，為俄警所覺而起<sup>⑥7</sup>。武昌革命爆發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亦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開會，討論臨時政府組織事宜<sup>⑥8</sup>。

清季革命運動的主要動力在海外，其在中國大陸建立基地，始於香港。由香港滲入華南各省，秘密組織雖有之，而無法公開活動，原因之一為缺少適當的租界<sup>⑥9</sup>。上海被用為革命的基地在一八九九年以後，由上海而滲入華中各省，其易於建立革命基地者，以上海、漢口等地有租界。漢口租界在掩護革命的地位上僅次上海，同為兩大革命活動的中心點。惟革命運動之借助於租界者，乃偶然之事，非必然之事。即無租界，革命亦可進行，惟其組織與宣傳的方式或將略有變更而已。

## (五) 結 論

一種政治或社會運動，常發自一人或少數人；其能成長、擴大與否，除客觀的條件外，端視此一人或少數人運動的力量與幅度而定。就清季革命運動而論，革命領導人網羅了各方面的勢力；外人的勢力不過為其中之一。惟新勢力的加入，容易促使革命運動的本質與方向發生變化；最顯著的事實是，在同盟會成立以後不久，孫逸仙已無法掌握整個的革命局勢，光復會只強調種族大義，共進會和中部同盟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

外人或外國作為革命的助力，是有其條件與限制的。就外國政府而論，大多是為己國之利益，與革命黨人作有限度的合作。一旦與清廷或另外一派勢力相結較為有利，即置革命黨人於不顧。一九〇〇年，革命黨人為爭取外援，曾作過兩方面的努力，但均勞而無功。其一、英國計劃促使李鴻章據兩廣獨立，欲引孫逸仙助之。

<sup>⑥7</sup> 俄警告知俄領事，俄領事通知清吏，於是兩國會同搜查爆炸地點，獲革命黨文件多種，於是清吏於城中大事搜捕革命黨，革命黨人人自危，遂起事。見宮崎滔天「支那革命軍談」頁92-94。

<sup>⑥8</sup> 菊池貴晴「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頁206-207。

<sup>⑥9</sup> 廣州之河南、廈門之鼓浪嶼雖有租界，然地位孤立。

因李不願背棄清廷，香港政府乃繼續執行放逐孫逸仙的政策。其二、日本計劃佔有廈門。欲結合廣東方面的革命黨人，乃與孫逸仙有所聯絡；既而計劃中止，即驅孫離境。武昌革命爆發後，列強初頗同情革命，惟助力很快轉移到袁世凱身上，革命黨人之趨於妥協，辛亥革命之不能澈底，與此甚有關係。自此以後，歷次革命之變質與失敗，幾均與外國勢力的參與有關。

參與辛亥革命的外國人，除部分係基於其與革命領袖的友誼外，大多係爲己國或個人之利益，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找機會。這可以日本的志士爲例子。日本志士在中國活動，大體可分爲三派：一是執行政府政策的，二是誘導或協助政府向亞洲大陸發展的，三是爲個人意圖或團體意圖而工作的。第三派人中不少有以協助中國革命爲事業的，但亦盡量不違背政府的政策。如武昌革命爆發後，日本政府初採排袁政策，川島浪速、松本菊熊一派即在中國北方作排袁活動。時孫逸仙、黃興等已在外交的壓力下採取了聯袁政策，惟少數革命黨人如白逾桓、程克、孫鐘等仍在北方作打擊袁世凱的活動。孫逸仙的密友平山周及小幡虎太郎等此時却在天津加入了川島的排袁工作<sup>70</sup>，雖可能是配合北方革命黨人的活動，也許是執行日本政府的政策，因爲平山周是爲日本外務省工作的。

租界作爲革命的助力，有如外國地區；它是革命黨人的庇護所。在一個專制國家，政治犯容易找到庇護所，對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推進，是有其積極意義的。清季革命黨人利用租界，是偶然的，不是有計劃的。上海、漢口等地有革命黨人聚集，便利用了上海、漢口等地的租界；革命黨人似無利用租界將革命勢力，擴張及於全國的計劃。雖是如此，革命勢力的擴張，如有租界可資利用，是易於爲功的。武昌革命爆發前後，北方革命黨人集於天津，原因之一，即爲天津設有租界之故。惟租界當局對革命黨人並無偏愛，亦不過維護租界之法權而已。

革命運動或任何其他政治和社會運動，是需要網羅或借助於各方面的力量的。但在吸收各種助力的同時，如何能不失原來的立場與目標，乃是何運動的領導人物所宜注意並設法防阻的。

---

<sup>70</sup>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頁168。